

粤港澳大湾区引进 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思考

□ 陈瑞娟

[摘要] 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各个国家争先抢夺的重要资源。未来,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趋势如何,以及
在当前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具有哪些发展优势,如何吸引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大湾区发展亟
需新的理论指导。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要把握国家和大湾区对国际人才的需
求,要抓住大湾区建设机遇期,适应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趋势,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全力
做好人才引进工作,以此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人才引进

[中图分类号] G3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744(2021)03—0067—09

DOI:10.13996/j.cnki.taqu.2021.03.008

在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齐心协力,全面抗疫,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稳步发展。在这次
疫情中,海外华侨华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促使他们树立起充足的信
心和满怀的希望,让他们思考应该怎样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对如何发挥自身的价值进行新思考。
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一个最佳机会。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未来发展前景无限,对于海
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
能否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引进、培养、使用和集聚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所以说,粤港澳大
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可以说是双赢的。

一、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情况

本文所指的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主要是指海外华侨华人中的高端人才。这一概念,区别
于外裔高层次人才(外裔专家)和海外华侨华人一般人才。这一部分人,主要包括华裔科技创新人
才、企业家、优秀青年人才、侨领等高端人才群体。

[收稿日期] 2021—05—06

[作者简介] 陈瑞娟,女,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及海外统战理论(广东
广州,510060)。

(一)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趋势

1. 海外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总趋势。当前,国际间的人才争夺战早已打响,全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国际人才。美国吸收了全世界60%以上人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寻找国际人才,如“联系新加坡”“德国学者组织”“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等等。欧美国家相对中国来讲有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就是长期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新加坡和日本基于国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情况考虑,放宽移民政策吸引高质量移民。加拿大政府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将移民政策与教育战略相结合,通过吸引与培养适合本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应用型人才,从而形成人才竞争良性循环。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近年来,中国也加入国际人才竞争中。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向中国流动、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向中国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通过梳理最近2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和学成回国留学人员的数据,可以发现完成学业后,截至2018年,有355.2万名留学人员选择返回中国发展。其中,从2012年开始,出现第一波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回国潮,而且留学人员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经有283.31万名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355.2万人的79.76%(截至2018年)。

表1 中国最近20年出国留学人员和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数据

年度	出国留学人员(万人)	学成回国留学人员(万人)	百分比
1998	1.7622	0.7379	41.87%
1999	2.3749	0.7748	32.62%
2000	3.8989	0.9121	23.39%
2001	8.3973	1.2243	14.58%
2002	12.5179	1.7945	14.34%
2003	11.7307	2.0152	17.18%
2004	11.4682	2.4726	21.56%
2005	11.8515	3.4987	29.52%
2006	13.4000	4.2000	31.34%
2007	14.4000	4.4000	30.56%
2008	17.9800	6.9300	38.54%
2009	22.9300	10.8300	47.23%
2010	28.4700	13.4800	47.35%
2011	33.9700	18.6200	54.81%
2012	39.9600	27.2900	68.29%
2013	41.3900	35.3500	85.41%
2014	45.9800	36.4800	79.34%
2015	52.3700	40.9100	78.12%
2016	54.4500	43.2500	79.43%
2017	60.8400	48.0900	79.04%
2018	66.2100	51.9400	78.45%
总计	556.3516	355.2001	63.8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达60.84万人,同比增长11.7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人员生源国地位。同年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48.09万人,较上一年增长11.19%,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达到22.74万人,同比增长14.90%^①。由此可见,我国留学人员出国学习、回国服务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

中国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据统计约有6000万,其中近400万是专业人才,行业涉及科教、文卫、金融、贸易等等,是庞大的人才库。其中,截止到2017年,美国亚裔人口2141.92万,其中华人以508.17万人居首,持有绿卡的华人和非法居留美国的华人未包括在内^②。

由此可见,中国正在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中国也从国际移民来源国不断成长为国际移民目的国。这其中,既包括“来华逐梦”的外裔国际人才,也包括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还有一部分深层次参与中国发展、日益加强与祖(籍)国联系、直至最终在中国置业落户的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港澳台同胞则作为境内人才纳入国内城市人口范畴。这些高知、高智、高技型的高层次人才的回流,有利于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带来了“人才红利”。未来这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将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同时国际竞争局势严峻,人才流动出现阻滞现象。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则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由于国外的疫情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海外留学人员正因为亲情、健康、家庭等因素,正寻觅更适宜下一阶段发展的区域及城市,普遍有回归的意愿。

中国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尽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故步自封,不是简单的扩大或刺激内需,而是提高供给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提高国内供给侧对产业链完整性的响应效率,从而提升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我们的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因此,需要海外优秀人才的加入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从而发挥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的带动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2. 原因分析。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是人口流动学上重要的宏观理论,是研究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由于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空间差异形成的推拉力量共同或单方作用机制导致移民的一种方法和理论。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巴格内(D. J. Bagne),他认为:改善生活条件是人口流动的目的所在,流入地的种种有利于改善生活的条件都将成为拉力,相反,流出地的种种不利条件就成为推力。这两股力量的前拉后推就推动着人口的迁移。结合推拉理论,分析高层次人才向中国流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海外人才形成强大拉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268倍,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快速上升到2019年的986515.2亿元。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③。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民生、生态等方面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中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宜商、宜业、宜居的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强起来的

时代,也是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一个宜商、宜业、宜居的中国正吸引着各国人才不断前来创业发展、置业移民。

二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减少等人口危机问题成为中国对人才保持旺盛需求的内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12.95%,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两个指标同时出现下降。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率10.94%,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10.48%,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呈现逐年明显下降的趋势。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减少,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此引发的社会及经济问题不容忽视。中国正从人口红利步入人才红利,国内多个城市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纷纷出台各种优惠和补贴政策,展开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其中,海外高层次人才是争夺的重点。

三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向高质量发展产生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巨大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将发展更多的新兴产业、高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保持对高层次人才尤其是科技创新人才的旺盛需求。

四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将带来高层次人才的大流动。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2017年,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之和为1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8.4%;人口总数为3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7.6%;对外贸易总额为9.3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7.8%,在全球贸易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④。同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多名代表参与,形成了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⑤。截止至2019年4月,亚投行已经从最初的57个创始成员国增加到97个正式成员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未来,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将出现大融合,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等方面将出现大流动。

五是中國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就給海外華僑華人帶去了信心和希望。中國吸引海外華僑華人回流的拉力在不斷增大。在中國國內抗疫取得成效之際,中國採取多種方式,如:捐贈醫療物資、提供經驗借鑒、派遣醫療團隊奔赴海外進行救援等等,對一些疫情嚴重的國家(地區)提供幫助,助力抗疫。同時,協助一些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有序回國,及時協調解決少數留學人員面臨簽證到期等問題。對留學人員在海外遭受歧視和攻擊等突發事件,及時進行有力的交涉。因此,不少海外華僑華人談及此,紛紛表示中國的援助令人安心與自豪。所以說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拉力在不斷增大。另外,國外對海外人才的推力也在不斷增大。一些國家的政黨、政要和一部分民眾有排外情緒、歧視性行為,尤其是某些國家對海外華人學者進行大規模審查,給海外華人造成較大困擾,加速海外

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回流。

(二) 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优势

1.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巨大,有望成为全球顶尖创新创业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正在迈向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它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以及广东省的九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依托。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对大湾区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发挥大湾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因为世界经济的60%集中在入海口城市,无论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正在建设的大湾区,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未来蓝图十分可期。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虽然其覆盖面积仅为5.6万平方公里,占不到全国1%;但是人口达6600万,占了全国人口5%左右。《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2020)》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62万亿元,其中大湾区广东九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9万亿元,占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80.7%。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设世界一流超大城市群的条件。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之首,已经初具国际贸易港的雏形。所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引导者,是中国金融、贸易和科技创新方面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有望成为世界级创新创业中心。如果大湾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必将成为世界级的发展平台。这样有活力的区域,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和虹吸力,是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优势所在。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各城市有侨乡优势,港澳地区本身就是港澳同胞居住地。广东作为全国的侨务大省,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拥有海外侨胞3000多万人,省内归侨10.17万人,以及侨眷3000多万人。广东海外侨胞占了全国海外侨胞的50%以上,可分为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遍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欧美、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省内归侨、侨眷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和梅州等侨乡地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13日在广东省汕头市考察时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一向有念祖爱乡的光荣传统,他们长期关注、大力支持广东经济的发展,其中,在广东的投资约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的70%。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有5万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广东从事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精密制造与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同时,2016年广东省审定并资助60位海外专家来粤短期工作项目,其中35位是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

3. 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坚实的合作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与海外华侨华人保持了密切联系,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形成了有效合作的坚实基础。不管是投资合作、贸易往来、共建发展载体,还是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都已有深厚的基础。以新加坡与广东

合作建设的中新知识城为例,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与新加坡合作建设的一个高端发展载体。中新知识城是继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后,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第三项大型项目。它是中国知识经济高地,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汇聚高端产业与人才,打造成为一个引领中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新知识城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投资共建的一个高端发展载体。除了中新知识城,像汕头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全国17个已建成的“侨梦苑”(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广州、江门各有1个侨梦苑)等,都是以华侨华人为主题的发展载体。这些已有的发展载体以及积累下来的发展经验、政策举措、合作机制、合作氛围等等,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巨大优势所在。

二、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这些世界上最重要的湾区无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球性的国际人才港。对照世界级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人才港建设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人才体制机制存在诸多障碍,统一的人才政策体系尚未建立,人才港的集聚辐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一点,不管是对海外华侨华人还是外国人、港澳台同胞,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人员流动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人才的流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为了最大限度控制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纷纷临时关闭边境,暂停签发签证和工作许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人才的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对全球高层次人才与留学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威胁。甚至有人预测:疫情后商务旅行的人数或将永久性地减少5-10%,国际人才的流动大打折扣。

(二)粤港澳大湾区引才体制机制存在障碍

由于粤港澳三地在政治、经济、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目前粤港澳三地在人才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上仍存在一些障碍,导致流动不畅,面临一些挑战。这主要体现在粤港澳人才资质互认、科技资金使用、通关便利化等方面。例如,从香港或者澳门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到内地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身份为境外人士,需满足《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获取《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和旅行证件,满足地方政府的就业许可要求,经过一系列审查后才可在内地就业。这一系列繁冗的程序影响着国际人才的流通。

(三)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没有专门面向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引才政策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库。但是,这一群体的巨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以人才工作为例,目前中国内地的引才政策以及国内各城市的引才政策,基本没有专门直接面向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海外华侨华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区别对待和特殊优惠政策,引才政策针对性不强,目标人群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回流祖国的积极性和热情。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目

前也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侨乡优势,打“侨”字牌,做“侨”文章,对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缺乏积极有效的招才引智手段。

(四)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尚未与国际接轨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是一座城市走向世界的名片,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商环境体现在多方面,例如:与国际接轨的经济运行方式、开放型的新兴产业体系、国际化的政府运作制度、高度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等等。粤港澳大湾区除香港、澳门两个国际大都市在营商环境的构建上远远领先外,内地其他9个城市由于在经济实力、行政级别、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程度的不同,导致在营商环境方面与港澳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将给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带来影响,无法实现城市群区域发展的一体化,无法顺畅地实现人力、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另外,尽管港澳同胞属于中国公民,但无法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例如:内地的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被视为“境外人士”。在资金融合方面,香港的企业或个人到内地投资,在行业准入方面有很多限制,仍然实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慢慢理清阻碍,推动香港、澳门和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顺利衔接。

(五)部分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对来华发展信心有待提升

海外华侨华人一般移居海外已有多多年,他们对祖(籍)国虽然有一定的感情认同和文化认同,但部分海外华侨华人早已形成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融入迁入地文化。特别是一些侨二代、侨三代,他们大多已经完全融入居住地的语言、文化,在语言、文化上已经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回流中国,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心存疑虑,需要较大的推力或者拉力才能够促成。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层次,由于缺乏了解,导致他们对到中国创新创业乃至置业落户存在不少顾虑。同时,由于国内的教育环境和教学条件未能充分满足海外高层次人才子女的就学需求,造成部分海外高层次人才只身回国创业,而将子女留在国外,常年两地奔波,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业的激情与家庭的稳定。

三、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几点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的发展要靠创新,创新靠人才。人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因此,我们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也在于人才。面对世界各地、全国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粤港澳大湾区要对标世界顶尖湾区建设,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勇气,拿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打破人才引进体制机制障碍,出台具有突破性的人才政策,才能实现打造世界级科创中心、国际一流湾区的宏伟目标。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打造一个跨国人才合作交流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严重影响。许多国家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影响着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选择,改变着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方向。我国应抓住海外人才回流的契机,创新引进人才体制机制,为海外人才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制定具体政策,为留住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提供保障。我们可以打造一个非政府的、跨国人才合作交流平台,以海外人才开发为重要切入点,为全球人才搭建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促进全球人才沟通合作。我们还要采取各项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建功立业。我们可以通过拓宽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的绿色通道,以及加大补贴的力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在多元文明交融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引进人才战略的总体布局。

(二) 创新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体制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确实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希望通过各项协定助推大湾区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制定更多共同的政策或规则来实现港澳与内地之间在货币、税制、人员往来、资金及资讯流通等方面的互动。要放开香港、澳门大学到内地独立办学的限制。要实施香港、澳门与内地资格认证互认。香港也可以充分利用大湾区建设的机会,将本地大学科研技术进行转移。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大湾区内高等院校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迫切的需求。要破除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共建共享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开放人才交流引进机制,创新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协同发展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为人才颁发“大湾区证件”,减少三地之间的通关时间,实现大湾区内部的相互顺畅通行。

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可以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以港澳地区为中转点,建立海外华侨华人乃至外国人才、国际人才与中国内地自由流动的人才体制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应当立足于国际化的大湾区,其人才体制机制应当与国际接轨,甚至要更优于当前最先进的国际人才体制机制。因此,尤其要建立能够吸引国际化人才来湾区发展的灵活用人机制。要发挥香港国际化城市优势,通过香港中转大力引进国际人才来湾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应当集合广州、深圳、香港现有人才政策,统一建立一个力度更大的湾区人才政策体系,而不是各自为政。

(三) 出台专门针对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引才政策

海外华侨华人回流中国与外国人移民中国,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流向中国发展。不同的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同宗同文,有感情基础、有历史渊源,更容易融入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是一种历史的大回归。因此,要建立与引进外裔专家来华工作生活略有不同的引才政策,着力解决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的后顾之忧。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华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后勤保障问题,急需政府解决。主要体现在解决户籍(人才绿卡)、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出行等问题。要解决身份问题,授予人才绿卡。在人才绿卡制度基础上,统筹解决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在华购买住房、申请驾驶执照、子女入学入托、参加国内高考等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专人专办、“一条龙”服务来回应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需求。<http://www.cnki.net>

2020年10月18日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中有多个条款与人才直接相关。比如,推进外籍人才签证便利化;探索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便利和紧缺人才职业清单制度;实施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制度……希望接下来将这些条款推向粤港澳大湾区,邀请更多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加盟,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想象空间。

另外,为了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压力,政府可以加大对重点企业和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落实“人才贷”,对企业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给予扶持和帮忙,对企业“共享”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给予保障,降低企业人才成本,从而避免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流失。

(四)打造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发展载体

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要有事业平台和创新创业载体支撑。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一带一路”建设、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建设,选择中新知识城、侨梦苑、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等作为试验平台和载体,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和开放新格局,吸引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集聚一批能够抢抓前沿科技、突破关键技术的科技新侨回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通过吸引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和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推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集成电路等高新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探索出一条“科技新侨助推新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和留学人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重点示范区。

(五)加大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组织宣传

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角度出发,属于各级政府管理范畴;从人才工作角度出发,则归口各级组织部门管理。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则属于海外华侨华人工作范畴,归口统战部门管理。从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角度上看,还属于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管理。如何把这项工作有效组织起来,整合工作力量,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协调机构需要统筹考虑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政府需要统筹考虑的。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统一粤港澳大湾区的LOGO,以一个整体对外展开宣传,将其放在国际大湾区发展的高度,树立创新创业热土形象,统一目标、统一认识,进一步加大在海外的宣传投放力度。要运用“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手段,强化同宗同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侨乡优势,大力弘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深入挖掘侨文化、侨历史,进一步增强对侨二代、侨三代等华侨华人华裔群体的文化感染力。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我们的人才战略应该与时俱进,以动制动,以变应变,运用超前的未来思维,近者悦,远者来,为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提前做好战略布局。

[注 释]

① 2017年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EB/OL]. 教育部网,2018—03—30.

② 1. 美公布人口数据,华裔2141.92万,其中华裔超508万居首[EB/OL]. 新华网,2018—05—04. (转第92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加强合作交流

1.加强国际合作

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商业银行要积极走出国门,学习借鉴荷兰银行、比利时富通银行以及汇丰银行等西方商业银行的成功经验,改革内部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在绩效考核体系中融入环境因素,创新自身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中推广,和国际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市场,通过与国际商业银行的合作不断拓宽现有业务渠道,提高服务效率。同时,着力推进国际碳交易计价人民币发展进程,提高自身在碳交易业务中的议价能力,强化人民币和碳排放交易的联系,建立完善碳排放市场中人民币流通体制,继而为国内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2.强化与环保组织机构协作交流

强化商业银行与环保组织机构合作交流,有效降低碳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重点关注环保相关政策、我国清洁发展机制及相关基金流动情况,主动参与碳金融相关业务,获取环保企业相关的信息。积极主动与环保组织协作交流,强化国内专业环保机构技术支撑,深化合作交流,更好指导碳金融业务发展。

[参考文献]

- [1] 樊鑫淼. 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 西南金融, 2016, (12).
- [2] 王子霖.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可持续激励机制研究[J]. 北方金融, 2018, (7).
- [3] 葛察忠, 翁智雄, 程翠云. 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态势良好[J]. 环境经济, 2018, (Z2).
- [4] 易诺, 黄波. 金融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策略分析[J]. 金融经济, 2018, (10).

□责任编辑:周权雄

(接第75页)

- ③ 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EB/OL]. 中国新闻网, 2020—02—28.
- ④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 2018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R]. 2018年5月.
- ⑤ “一带一路”:2017成果亮眼2018行稳致远[EB/OL]. 新华丝路网, 2018—02—02.

[参考文献]

- [1] 周敏, 张国雄. 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 [2] 李明欢. 国际移民政策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 [3] 刘国福. 侨务变化与侨务政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 [4] 郑永年.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5] 国世平.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6] 王辉耀, 苗绿.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责任编辑:温朝霞